

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机制及社会动因

许庆瑜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25年7月12日；录用日期：2025年8月7日；发布日期：2025年8月22日

摘要

本文基于词汇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晒”“刷”“卷”“粉”等多个单音节新兴动词为核心语料，系统探究其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因。研究发现，单音节新兴动词的来源存在他源性和自源性两种。生成机制上，包括隐喻转喻机制、词语模框架下的类推机制、构式压制机制，如“晒”从“物理晾晒”到“网络分享”的隐喻映射、“卷”依托“卷+X”词语模的类推造词、“粉”在“V动+粉”构式压制下的由名转动；社会动因层面，语言表达的空位条件、网络文化的空前繁荣、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外来文化和语言接触共同构成核心驱动力。本文通过对典型语料的深度剖析，单音节新兴动词生成中语言系统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单音节，动词，语素化，生成机制，社会动因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Social Motivations of Monosyllabic Emerging Verbs

Qingyu X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Jul. 12th, 2025; accepted: Aug. 7th, 2025; published: Aug. 22nd,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lexic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takes multiple monosyllabic emerging verbs such as “shai”, “shua”, “juan”, and “fen” as the core corpu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ir generation mechanisms and social motivation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sources of monosyllabic emerging verbs exist in two forms: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In terms of generation mechanisms, they include metaphor and metonymy mechanisms, analogy mechanisms within word schemas, and construction suppression mechanisms, such as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of “shai”

from “physical drying” to “network sharing”, the analogy-based word formation of “juan” relying on the “juan + X” word schema, and the name-based transformation of “fen”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V action + fen” construction. At the social motivation level, the empty position conditions of language expression, the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of network culture,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language contact jointly constitut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ypical corpora,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 system and social culture in the generation of monosyllabic emerging verbs.

Keywords

Monosyllable, Verb, Morphemization, Generative Mechanism, Social Motiv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晒”“卷”“粉”“刷”等单音节新兴动词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高频涌现,从“晒照片”的信息分享到“卷学历”的竞争焦虑,从“刷短视频”的行为模式到“粉偶像”的情感投入,单音节新兴动词已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其生成与演化作为词汇系统动态发展的典型样本,已成为汉语词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具体个案的语义演变与局部机制分析,尚未形成对该类词汇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因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下面对当前关于“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因”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在生成机制方面,张小平(2018)《构式压制视域下汉语词素义的生成与演化——以新词素“粉”为例》[1]基于构式压制理论,以“粉”为研究对象,剖析其从无意义译音音节演变为名词性词素再转化为动词的语义演变链,发现“粉”的意义演变受到构式压制的深刻影响;刘晓晴(2023)《词汇构式化视角下的成对词研究》[2]从词汇构式化视角指出,成对词的生成是形式固化与意义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构式化过程涉及实体构式与图式构式,依赖认知机制中的组块心理和类推机制;李金平(2017)《认知视角下当代汉语动作动词“刷”新义衍生现象研究》[3]指出,单音节新兴动词“刷”的生成机制以原型义“清除或涂抹”为基础,通过转喻和隐喻的认知机制,结合意象图式的跨域投射,实现从具体动作义到“划动”“扫描”“更新”等多元新义的衍生;夏秀文(2024)《新兴词语模“秒X”“闪X”探析》[4]指出,“秒”“闪”以隐喻机制为核心,完成从“时间单位”和“闪电”义到“极短时间内”的语义映射;周有斌(2005)《“秀”的组合及其语素化_周有斌》[5]指出,单音节新兴动词“秀”以英语“show”的音译为起点,通过简缩、重复构词和类推等方式实现语素化,进而衍生出“表演”“宣传”等多元语义。

在社会动因方面,杨绪明(2010)《“晒”族新词语的衍生及其流变》[6]指出,微博、微信等平台的互动性与匿名性,催生“晒客”群体的自我展示需求,其“晒幸福”“晒烦恼”等行为本质是虚拟空间的身份认同建构。彭思雨(2023)《从网络流行词“内卷”看“卷”字的词义衍生》[7]指出,“卷”作为单音节新兴动词,其词义衍生的社会动因主要在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与竞争压力加剧、资源有限性引发的内部激烈竞争、语言经济性原则对“内卷”简洁表达的推动,以及使用者求新求异心理对网络流行语传播的促进。周启强、谭丹丹(2013)《从模因论看网络新词语的构词特点》[8]从模因论角度指出,网络新词语的构词特点源于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其中强势模因的变异性和时尚性是其流行的内在动因;张利红、段

绪(2020)《基于模因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探究——以“2019年十大流行语”为例》[9]结合模因理论分析2019年“十大流行语”指出,网络流行语通过表现型和基因模因型实现复制传播,其生成与扩散是语言模因复制效率与社会交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刘言(2024)《模因论视角下的2021~2022年度新词语研究》[10]从模因论视角对445条新词语展开研究,剖析其的语言学特征、模因类型、传播周期及动因等,指出单音节动词“卷”作为强势模因的传播机制;袁昱菡、匡鹏飞(2021)《“宅”字新义的形成与演变》[11]指出,日语“御宅”借入汉语时因汉日语义系统差异被重新解读,通过结构分解、语义增删及双音节减缩等机制实现本土化改造,“宅”从指人名词素演变为兼具动词、形容词功能的单音节词。

上述研究各有侧重,虽已从认知机制、社会因素等维度揭示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与演化逻辑,但尚未形成整合度较高的理论框架。本文结合具体语料,参考现有研究对“晒”“卷”“刷”等个案的分析思路,尝试梳理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路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其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因做进一步的归纳与补充。

2. 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机制

2.1. 来源

单音节新兴动词的来源可大体分为他源性与自源性两大类。他源性新兴动词是指通过语言接触从外族语言中借入的动词,主要为英源词与日源词,其他语源的较少。如英源词“晒”音译自英文“share”,取其“分享”之意;日源词“宅”源自日语“御宅族”,表“居家不出”。自源性则包括普通话系统内部衍生与汉语方言引进两种。如汉语词汇“刷”的“划动浏览”义是“刷”基础义的语义衍生;汉语方言“怼”通过网络传播进入普通话,表“言语反驳”,兼具口语化与戏谑色彩。

2.2. 生成机制

2.2.1. 隐喻机制与转喻机制

隐喻机制与转喻机制是单音节新兴动词生成时的重要机制。大部分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都与其有关。

1) 隐喻机制

乔治·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让人们意识到隐喻是一种跨域映射,语言表达的认知过程就是从源域向靶域的映射过程。隐喻的运作机制大致包括语义冲突、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两个对象的互动以及两个领域的相似性三个方面[12] (p. 137)。下文将以“晒”作为本节主要案例进行分析阐释。

a) 语义冲突

语义冲突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语言学里的语义冲突具体指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并没有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言使用方式,违反了语义选择的限制。

(1) 小偷盗别墅晒照片炫富,带走看一半《资治通鉴》(《扬子晚报》,2015-6-9)

(2) 谷歌员工因晒工资丢掉饭碗。(央广网,2015-7-26)

整个例(1)和例(2)句子的焦点为“晒”,句中其他部分为“框架”。如果按照“晒”的原型义理解,那么例(1)和例(2)的焦点“晒”与框架的意义存在一定的冲突。“晒”作为物理动作动词,一般用于“衣服”“粮食”等物品,表“把东西放在太阳光下使它干燥”义,不能表达“炫耀、显摆”义,这里却用在了“照片”“工资”等通常不会在阳光下晒干的物品上,造成语义上的冲突。

b) 目标域与源域的互动

隐喻涉及两个语义域,一个是结构相对清晰的源域,一个是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两个不同领域

的互动是隐喻产生的具体方式[13]。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人们通过隐喻将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以另一种视角感知和认识目标域。例(1)和例(2),涉及到“晒”本义和“公开、炫耀”两个语义域。在认识新事物的进程中,人们观察到“在网络平台公开、炫耀信息”这一相对陌生的语义域与“晒”本义所表达的语义域之间的关联,将二者进行类比,使“晒”本义中“使物品暴露于阳光之下”的意象图式结构作为源域,映射到“网络公开、炫耀信息”的语义域中,构成隐喻,进而实现对“公开、炫耀”语义域的理解。

c) 相似性

相似性是隐喻互动过程的根据,是隐喻得以和其它相关语言现象区别的重要条件[12] (p. 138)。只有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相似关系,两者之间才能建立联系,隐喻才能成立。“晒”的基义为“在阳光下吸收光和热”,物体需经曝露于太阳下方能完成光和热吸收过程,该基义所对应的动作包含将物体从隐蔽空间取出的语义要素。创作者基于此认知经验,将其映射至网络语境,当前“晒”的流行语义均隐含“使事物得以呈现”的动作特征。使源域“在阳光下吸收光和热”与目标域“公开、炫耀”之间具有相似性,架起了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桥梁,构成隐喻。

2) 隐喻机制

与隐喻相同,转喻也是单音节新兴动词生成的重要机制。转喻通过强调或凸显同一语义框架结构中的某一成分,使新义得以衍生。下文将以单音节新兴动词“刷”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阐释。

(3) 微信可以在电脑上刷朋友圈了,但这不只是方便上班“摸鱼”。(搜狐网,2021-3-12)

(4) 短视频真的是越刷越上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时间仿佛被加速了一样。(网易,2024-6-21)

例(3)和例(4)中的“刷”表“划动使浏览”义,表示的行为一般是手部动作“划动、拉取”,同时伴有目光的扫视、浏览。这较其原型义“清除/涂抹”发生明显变化,但原型义中的“空间移动”义被保留下来并被凸显。

(5) 一些不法分子瞄准了这一市场需求,开发了各种刷单和刷好评的工具,并借此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链。(搜狐网,2025-4-12)

(6) 近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市场监管所对一宗虚假网络交易刷单案作出结案决定。(中国质量新闻网,2023-7-25)

例(5)和例(6)中的“刷”表“反复操作”义,其中既包括不特别强调目的的“反复操作”,也涵盖“使提高、增加”和“使快速获取”为目的的“反复操作”。与原型义相比,这里的“刷”语义进一步泛化,着重凸显了原型义中“反复”这一行为特征——“刷”从表示动作行为到凸显动作行为的某一特征,即由整体转喻部分,进而泛化“反复操作”义[3] (p. 33)。

当然,在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中,隐喻和转喻并不是两种截然分开的完全独立的认知过程。两种机制有时会相互结合、共同作用。

部分网络流行语的词义扩展过程包含着隐喻和转喻思维的共同作用。如流行语“怼”,由本义“怨恨”衍生出“攻击”“用言语攻击,互相指责”“互相调侃、吐槽”“不礼貌地对着、冲着”等流行语义,其语义演变过程主要是隐喻机制在起作用。但由“攻击”衍生出义项“用言语攻击”是转喻思维的结果。用言语攻击属于非物理攻击,指借助话语这一媒介展开的攻击形式,“用言语攻击”和“攻击”是方式和行为的关系[14]。

2.2.2. 词语模框架下的类推机制——以“卷”为例

所谓类推是指“以某个词为原型,通过替换其中某个词素的方法创造新词的过程或结果”。汉语的

辞格类型很多,在构造新词方面最常见的就是类推的方式。而类推本身也是借助“词语模”进行的[15]。李宇明在上世纪末提出了“词语模”概念,他认为词语模是一种造词框架,该框架由不变成分“模标”和可变成分“模槽”两部分组成,语用主体可视需要通过替换模槽成分创造新词语[16]。单音节新兴动词“卷”的语素化与成词过程,与“词语模框架下的类推机制”紧密相关。

“卷”的产生最初源于社会领域学术用语“内卷化(involution)”,“内卷化”是意译词,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因外部受限制停滞不前或无法转换为更高级模式,只能内部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后扩大至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应用范围逐渐广泛。在汉语传播中,作为译介学术术语,“内卷化”首先经历双音节化压缩为“内卷”,形成“内+卷”的名词性复合词结构,用来指代行业内的非理性竞争。此时的“卷”作为复合词的后缀语素,依附于“内”的空间隐喻存在,仅具备“弯曲缠绕、受力紧缩”的物理动作义,尚不具备独立表义功能。

然而,汉语词汇系统中固有的“形容词性模标+名词”框架,为“内卷”提供了初期的构式定位。在“内卷”持续使用的过程中,汉语系统通过类推机制剥离“内”的修饰成分,“卷”以单音节语素身份承载“过度竞争”的核心语义,完成从黏着成分到自由构词单位的蜕变,这一过程遵循“词语模”的“核心义素提取”规则,即通过舍弃非能产性成分,保留具有类推潜力的模标——“内”作为仅表空间范畴的修饰成分,因语义限定性强、无法与“学历”“绩点”等名词自由组合,在构词过程中逐渐显示出非能产性;而“卷”作为核心动作语素,其“卷曲缠绕”的原型义通过隐喻映射抽象出“过度竞争”的语义内核,凭借单音节形式的灵活性和语义泛化潜力,成为可独立参与构词的模标。这一过程同时暗合了李宇明(1999)提出的词语模“模标凸显”规律,即通过高频使用使复合词中的某一成分成为语义核心,为后续类推造词奠定基础。

当“卷”以单音节语素身份进入“卷+X”构式时,汉语中既有的“动宾结构”框架成为类推模板。通过将“卷”与名词性模槽组合,形成“卷工资”“卷学历”等表达式,“卷”的语义从静态的“竞争状态”转化为动态的“主动发起竞争行为”,完成从名词性语素到动词性语素的转换。随着“卷+X”构式的高频使用,类推机制进一步推动“卷”的句法功能扩展与固化。“卷”开始适配更多的语法环境,如受程度副词修饰下的“太卷”“非常卷”,状中结构下的“卷加班”“卷考证”。

2.2.3. 构式压制——以“粉”为例

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同样受到构式压制的影响。构式压制是调节语义冲突和类型错配的机制,有时也会引起构式中某个成分的意义变化。当代汉语中,“粉”由无意义的译音音节演变为名词性词素,再转化为表事件的动词,形成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由专指到泛指进而转指的语义演变链。“粉”的意义演变是构式压制的结果,“粉”族构式与“粉”新义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促成“粉”义的发展演变[1](p. 171)。

“粉”来源于英语词“fans”的音译词“粉丝”,它与现代汉语中表示粉末的“粉”意义上没有联系,只是由于音译外来词造成了形体上的偶合,是同形同音关系[1](p. 172)。单音节新兴动词“粉”是对“粉丝”的减缩使用,最初是英语“fans”音译词“粉丝”中的无意义音节。在汉语双音构式的压制下,“粉丝”采用汉语固有词形记录英语“fans”的语音形式。由于汉语双音构式在构词法中的优先性,单音节的“粉”最初未成为新式表达。在减缩过程中,受汉字的表意性和离散性的影响,“粉丝”这个本不可分析的单纯词被拆分,“粉”作为“粉丝”的减缩成分被提取出来和其他词素共同构成新词,形成新构式[1](p. 172),如“凉粉”“职粉”“散粉”“粉头”等。在“X粉”构式中,受定中构式的压制,“粉”作为无意义音节充当中心成分,出现类型错配,从而被迫语素化,由无意义音节升级为语素,表“迷恋、崇拜(某个名人)”,完成了语素化的过程。同时,构式的能产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粉”的语素化。

后来,“粉”族构式不断衍生,“粉”的意义进一步泛化。在“N物+粉”次构式中,“粉”所关涉对象添加了[+物]的语义特征,不再局限于[+人],如“果粉”“舌尖粉”等。在“Adj虚+粉”次构式里,“粉”添加了[+虚拟]的语义特征,其关涉对象可以是微博、微信中的虚拟人或物。在“V名+粉”新构式中,“粉”的意义彻底泛化为某些人或物的支持者和关注者。

在“粉”族词语发展的过程中,大量“V动+粉”的新构式出现,如“求粉”“骗粉”,而“V动+粉”中的“V动”均属谓宾或名谓宾动词性语素,处于宾语位置的“粉”受此压制也沾染了动词的性质。“互粉”中“粉”直接受副词“互”修饰,动词性更明显。此时,“粉”出现范畴错配,受到构式压制,语法性质由名词性转为动词性,意义从支持者和关注者引申出关注、支持的陈述义。这是因为“粉”所激活概念框架中的规约化属性是关注和支持,在构式压制下,这一属性凸显,从而实现了意义转化。

3. 单音节新兴动词生成的社会动因

3.1. 社会发展产生的语用需要

3.1.1. 语言表达的空位条件

满足需求是促动一切新生事物出现和发展的最直接动机,单音节新兴动词的出现也是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生活中需要满足某种表达,存在着某种需求,人们就按照新词语的构造机制进行创造,从而使语言满足动态发展的要求,所以新词语必须是为满足某种需求而造的,而这种需求也就是空位制约条件[17]。

数字化媒体催生下的“晒”,其存在是为填补网络语境中“公开分享信息”的语义空白——传统的“晾晒”义无法涵盖“通过数字平台主动展示生活”的行为特征,而英语“share”的音译为这一空缺提供了适配性表达;社会文化转型中,“宅”的语义迁移则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主动缩减社交、重构生活边界”的新型生存状态描述需求,其从日语借词到汉语动词的功能转化,本质是对“居家生活方式”概念缺场的语言补位。

3.1.2. 网络文化的空前繁荣

当前中国网络文化呈现全民参与的繁荣生态:截至2023年底,网民规模达10.92亿,互联网普及率77.5%,构成全球最大数字社会。社交平台成为文化生产核心场域——微信以13.6亿月活用户集成社交、支付、内容生态,抖音、B站等平台催生Z世代主导的UGC创作,日均产生超亿条短视频、图文内容。网络文化全面融入主流,其空前繁荣成为推动新兴动词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自我呈现时比在真实世界里更为自由,每个上网者都处于一个相对个人化的自主空间内,网络交往取消了一切现实交往中社会地位、文化、身份和职业等的高低贵贱之分,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共享网上信息资源[6](p. 99)。这种自由性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表达摆脱传统语法的严格约束,允许黏着语素突破功能限制转化为独立动词。自由的表达环境也降低了语义创新的接受门槛,使隐喻转喻机制更易触发新义的生成。

同时,在网络文化空前发达的背景下,网友求同从众、求新存异的语言认知心理,成为新词语快速滋生并流行的助推剂,“求同从众”的心理使人们在言语使用上向大众时尚看齐,并在自己的话语中主动使用或模仿流行词语的行为。而“求新存异”的心理让人们在语言的使用中,对既有的传统表达方式会慢慢产生厌倦感,总会想方设法地追求新奇、陌生化的词语和言语表达方式,两者共同推动了网络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与流行。

3.1.3. 社会现象的语言映射

语言作为社会认知的符号载体,其演变轨迹深刻反映时代的变迁。单音节新兴动词的语义生成与扩

散,本质是时代变迁下的社会现象在语言系统中的镜像投射。

“卷”的语义泛化是当代社会竞争焦虑的典型语言映射。洪斯蔚指出,该词从学术领域的“内卷化”概念剥离,经网络传播衍生为动词性表达,其语义嬗变轨迹折射出教育、职场等领域的过度竞争生态。当“内卷”成为群体对资源有限性的共识性描述时,“卷”通过类推机制快速覆盖多元场景,形成“竞争-压力-表达”的闭环。

“宅”的语义迁移深刻反映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方式转型。袁昱菡、匡鹏飞曾指出,该词从日语借词“御宅族”的亚文化指称,经认知隐喻泛化为表“缩减社交、依赖虚拟空间”的动词。这一演变与城镇化进程中“空间压缩”及数字技术普及直接相关:“宅家办公”“宅文化”等表达的高频使用,标志着居家生活从边缘选择演变为主流范式。

3.2. 语言表达经济原则

语言经济原则是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纲要》中提出的。它是指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人们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作为支配言语活动的核心规律,本质上要求在确保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以最小符号消耗实现最大表达效能,这一原则在网络讯息时代的语言创新中呈现出深刻的适应性演变。网络交际的即时性与高频性特征,迫使语言系统向“快速编码-高效传播-精准解码”的范式转型,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与扩散正是这一转型的典型产物。网络传播的技术特性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原则的支配作用,迫使表达者采用“去冗余化”策略,而单音节动词因形态简洁、语义聚焦成为优选符号。

3.3. 模因理论

除了上述社会发展与语言表达经济原则的影响,单音节新兴动词的产生还与交际主体大脑内的模因有关。“模因”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演化理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其1976年发表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来的。模因理论一经提出,就被大量学者用来解释文化及语言的发展规律。何自然认为语言模因的传播方式主要为模因携带模因宿主的意图,使交际对象认可宿主所传达的信息,语言模因也随之“传播”到交际对象的大脑中。通过上述的传播方式,语言模因通过语言在人群中不断重复与类推,最终达到大范围普及效果,完成信息的传播[18]。

互联网时代,社会语境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一些旧模因重新激活,得到了广泛的复制与传播,如“刷”“逛”这类强势模因由最初的“清除”“闲游”义延伸出“快速浏览电子信息”的新义,在与“微博”“知乎”“抖音”等的组配中,该新义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不断被交际双方模仿、复制、传播、重复。

3.4. 外来文化与语言接触

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跨文化语言接触成为单音节新兴动词生成的重要社会动力。英语、日语等外来语言通过国际交流、媒体传播等渠道与汉语频繁互动,其词汇及表达习惯渗透至汉语系统,推动旧词产生新义或衍生新用法。其中,英源词的影响体现为汉语对英语词汇的借用与改造,如“秀”因与英语“show”的展示义契合,在网络语境中从双音节词“作秀”中剥离,独立为表“主动展示”的单音节动词,广泛用于“秀才艺”“秀生活”等表达;日源词则通过亚文化传播路径影响汉语,如“宅”借自日语“御宅族”,原指特定亚文化群体,经网络社群使用后,逐渐摆脱群体指称功能,演变为描述“主动居家、依赖虚拟空间”的通用动词,从文化传播视角看,这类动词的生成是外来语言元素与本土语言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既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也体现了汉语通过吸收外来资源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其本质是社会发展进程中语言对多元文化接触的动态响应。

4. 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因的互动

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是生成机制与社会动因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的结果,并非两类因素的简单叠加。社会动因作为底层驱动力,通过激活特定的认知机制为词汇创新提供路径,进而推动构词方式的选择与固化,形成“社会需求→认知映射→构词实践”的动态链条。

以“卷”为例,社会竞争焦虑的加剧催生了对“过度竞争”现象的表达需求,这种需求首先激活隐喻机制——“卷”的原型义“卷曲缠绕”与“竞争中相互纠缠、难以挣脱的状态”存在认知相似性,使“卷”从双音节“内卷”中剥离为核心语素;同时,社会对“精准描述多元竞争场景”的诉求,推动其依托词语模框架实现类推构词,通过“卷+X”(如“卷学历”“卷加班”)的形式覆盖不同竞争领域。在此过程中,社会竞争压力既为隐喻映射提供了现实依据,又通过对表达效率的要求促使类推机制发挥作用,使“卷”的动词化既符合认知逻辑,又适配社会场景。

“晒”的生成同样体现这一互动逻辑:网络文化中“虚拟空间自我展示”的社交需求,激活了“晒”从“物理晾晒”到“网络分享(公开信息)”的隐喻映射(认知机制)——“晾晒”的“公开性”特征与网络分享行为的核心属性高度契合,使“晒”自然成为新行为的编码符号;而社会对“简洁表达具体分享内容”的需求,进一步推动其通过类推机制生成“晒照片”“晒工资”等系列表达,在高频使用中固化为稳定动词。

“刷”的演变则凸显了转喻机制与社会动因的关联:移动互联网时代“快速获取碎片化信息”的行为需求,激活了“刷”从“用刷子涂抹/清除”到“手指在电子屏幕上快速划动”的转喻映射——因“刷”的工具属性与“划动”动作的紧密关联,转喻成为语义衍生的关键路径;随后,社会对“高效描述不同信息获取场景”的诉求,推动其通过类推机制生成“刷短视频”“刷朋友圈”等表达,使“刷”的新义在多样化场景中得以巩固。

可见,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的激活依赖于特定社会需求的驱动,而类推等构词机制的选择则是社会需求对表达效率、场景适配性要求的体现。生成机制为社会动因提供了词汇创新的“技术路径”,社会动因则为生成机制的启动与运行提供了“现实土壤”,两者的动态互动共同促成了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与流行。

5. 结语

单音节新兴动词的生成与演变,是汉语系统在认知机制与社会文化双重作用下的动态产物。

从生成机制看,“晒”“卷”“刷”“粉”等词通过隐喻转喻的认知映射、词语模框架的类推造词及构式压制,实现了从语素化到独立动词的功能突破;而在社会动因层面,网络文化的空前繁荣、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网民的求同从众、求新存异的心理,以及跨文化的语言接触,共同构成了此类动词流行的外部推力。

归根结底,单音节新兴动词的演化轨迹,本质是社会现象在语言系统中的鲜活镜像,这些词语既是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也是民众认知与心态的晴雨表,其动态发展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体系,更为我们观察语言与社会的共变规律提供了独特视角。

参考文献

- [1] 张小平. 构式压制视域下汉语词素义的生成与演化——以新词素“粉”为例[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171-176.
- [2] 刘晓晴. 词汇构式化视角下的成对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阜阳: 阜阳师范大学, 2023.
- [3] 李金平. 认知视角下当代汉语动作动词“刷”新义衍生现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 [4] 夏秀文. 新兴词语模“秒 X”“闪 X”探析[J]. 现代语文, 2024(11): 82-89.
- [5] 周有斌. “秀”的组合及其语素化[J]. 语言文字应用, 2005(4): 61-65.
- [6] 杨绪明. “晒”族新词语的衍生及其流变[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0(2): 96-100.
- [7] 彭思雨. 从网络流行词“内卷”看“卷”字的词义衍生[J]. 今古文创, 2023(11): 130-132.
- [8] 周启强, 谭丹丹. 从模因论看网络新词语的构词特点[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6(5): 139-141.
- [9] 张利红, 段绪. 基于模因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探究——以“2019 年十大流行语”为例[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3): 85-90.
- [10] 刘言. 模因论视角下的 2021-2022 年度新词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4.
- [11] 袁昱菡, 匡鹏飞. “宅”字新义的形成与演变[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3): 91-100.
- [12]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98-106, 160.
- [13]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4] 洪斯蔚. 流行语“内卷”的多维度考察及其对外汉语教学建议[D]: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 厦门大学, 2022.
- [15] 郑颖琦. 类推机制下单音节流行语素的成词动因考察[J]. 语文学刊, 2012(9): 53-54.
- [16] 赵艳梅, 杨文全. “词语模”视域下汉语新词语创制的研究实践及其理论探索[J]. 励耘语言学刊, 2023(2): 201-219.
- [17] 张春华. 新词语的构造机制及相关问题[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8.
- [18] 何自然. 流行语流行的模因论解读[J]. 山东外语教学, 2014, 35(2): 8-13.